

广东省高等学校博士导师丛书

王季思教授 古典文学论文选

博

士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东省高等学校博士生导师丛书

王季思教授古典文学论文选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季思教授古典文学论文选/王季思著.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10

(广东省高等学校博士导师丛书)

ISBN 7-5361-1901-1

I. 王… II. 王…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2408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1.125 印张 260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目 录

《西厢记》叙说·····	(1)
以《凤求凰》到《西厢记》	
——兼谈如何评价古典文学中的爱情作品·····	(21)
《西厢记》的历史光波·····	(43)
关于《西厢记》作者的问题·····	(60)
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70)
关汉卿的创作道路·····	(81)
关汉卿战斗的一生·····	(107)
谈关汉卿的《鲁斋郎》杂剧·····	(117)
《诈妮子调风月》写定本说明·····	(123)
《琵琶记》的艺术动人力量·····	(146)
怎样探索汤显祖的曲意	
——和侯外庐同志论《牡丹亭》·····	(158)
《桃花扇》校注本前言·····	(172)
我国戏曲的起源和发展·····	(199)
谈《录鬼簿》·····	(212)
元人杂剧的本色派和文采派·····	(219)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前言·····	(253)
略谈比兴与形象思维·····	(275)
苏轼试论·····	(280)
从宋词里接受有益的东西·····	(303)
怎样评价柳永的词·····	(311)
白石《暗香》、《疏影》词新说 ——兼谈如何评价婉约派的词风·····	(320)
姜夔[平调满江红]词浅释·····	(329)
金元散曲的兴起与衰亡·····	(333)
后记·····	(350)

《西厢记》叙说

一 元微之的《莺莺传》

大约在唐德宗贞元末年（约在公元 802—804 年），当时跟白居易齐名的诗人元微之（公元 778—831 年）写了一篇《莺莺传》，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1]。因为传里录了一首元微之的《会真诗》，后人多称它作《会真记》。记里说莺莺的母亲郑氏和张生的母亲是从姊妹；宋人王性之即根据这一点和元微之其他方面有关的诗文，考定张生即是元微之，莺莺是永宁尉崔鹏的女儿，是元微之的姨表妹^[2]。本来在北宋熙宁、元丰（公元 1068—1085 年）以前，有的学者以为《莺莺传》里的张生即是贞元、元和间的诗人张籍^[3]；到赵令畤《侯鯖录》介绍了王性之这段考证之后，人们才一致确认张生即是元微之。至于莺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那是直到近人陈寅恪先生的《读莺莺传》才有比较详实的说明^[4]。陈先生根据唐代士大夫阶层的社會习俗和元微之的《梦游春诗》、白居易的《和元微之梦游春诗》，断言“莺莺所出，必非高门”。他说：“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陈先生以研究历史的方法，给《莺莺传》作了正确的考据，澄清从北宋以来许多人对《莺莺传》的错误看法，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唐人小说有很大的帮助。但也有些学者根据陈先生还没有十分确定的意见，即举《莺莺传》和

《霍小玉传》作为唐代进士与娼妓文学的代表作品^[5]，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元微之集里有《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间四句是：“山岫当街翠，墙花拂面枝；莺声爱娇小，燕翼玩逶迤。”句下自注说：“予昔赋诗云：‘为见墙头拂面花’惟乐天知此。”又微之《嘉陵驿诗》第二首：“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月明西畔廊。”题下自注说：“篇末有怀。”^[6]从这些作品里，我们可以体会到《莺莺传》里“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一节情事应该是真实的。这就说明元微之和他所托意的《莺莺传》里女主人公的恋爱是在月下偷期的秘密形式下进行，不像《霍小玉传》里的李十郎公然地到霍小玉家里求欢。微之这一段恋爱过程，除了他最知己的朋友如白居易、杨巨源、李绅等几个人知道外，还是要保守秘密的。这和当时一般进士对娼妓的态度，也显然有所不同^[7]。

大约唐代士大夫阶层一方面由于沾染西北胡族的习俗，男女之间的接触比宋元以下为自由；一方面由于封建社会门第的限制，聘财的需索，婚礼的繁缛，若非出身高门或少年科第得意，在婚姻上很难得到美满的结果^[8]。因此男女在结婚以前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自由恋爱，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元微之、崔莺莺不必说了，就是白居易也有过这一类故事的^[9]。可是在封建社会里，这种恋爱绝大多数是以悲剧终场的，这中间更其悲惨的往往是女性的一面。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即为当时这种习俗，对女性的一面提出了告诫。而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也引《莺莺传》为《井底引银瓶》诗最佳的例证^[10]。

唐代习俗，朝廷大臣每每在新进士及第时选择女婿^[11]。元微之《赠别蒲州诗人杨巨源诗》：“忆昔西河县下时，青衫憔悴宦名

卑；揄扬陶令缘求酒，结托萧娘只在诗。”^[12]蒲关在黄河西岸，这正是写他自己少年时在蒲州的生活情况的。就诗意看，莺莺的爱上微之，可能是为他的才华所耸动，知道他是可以由文词科举进身的。如果微之在制科得中之前，和莺莺的婚姻名分已定，那他们双方关系也许还有保障；不然，微之少年功名得意，正是长安大族择婿的对象，莺莺门户比较低微，自然不容易和他们竞争。《莺莺传》里说张生以文调及期将西去长安时，莺莺即心知将要永别，“投琴拥面，泣下流连”。果然后来微之试判得中，选授秘书省校书郎，即别娶韦氏，遗弃了莺莺^[13]。微之、莺莺的故事，实际是和后来秦香莲、赵五娘的悲剧同一类型的。不过秦、赵因夫妇名分已定，还可到京师寻访丈夫，不像莺莺的“没身永恨，含叹何言”！

元微之的少年境况相当穷苦，我们就他早期所作的许多《新乐府》看，他无疑的跟白居易、李绅都是当时比较进步的诗人。他少年时和莺莺的恋爱，就当时社会习俗说，也应该是一种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浪漫行为。虽然后来微之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抛弃了莺莺；然而即在微之跟韦丛结婚之后，他对于自己少年时这一段珍贵的恋爱过程，还是念念不忘、见之吟咏的。陈寅恪先生《井底引银瓶诗笺证》说：“乐天诗中之句，即双文（双文即莺莺）书中之言。”元微之，作为一个和白乐天志同道合的诗人看，对于当时封建社会对待那些痴儿怨女的残酷，是不能不体会到的。因此他在《莺莺传》里一方面真实地写出张生和莺莺在恋爱成功时一种喜出望外的心情，一方面转录了莺莺给张生的信，替当时封建社会里被遗弃的少女倾吐出胸中的怨恨与不平，这是元微之在这篇小说里写得最成功的地方。

我们今天读《莺莺传》，最引起我们反感的是篇末的一段议论，

认为张生的终于抛弃了莺莺，是“善补过”。这些地方的确露骨地表现了封建社会士大夫对待妇女的观点，把妇女视为玩物，而又以无赖的口吻来辩解自己的负心。男女恋爱始乱终弃的现象在当时社会是不断发生的。《霍小玉传》写李十郎后来三娶都没有好结果，即是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这些轻薄少年的不满。虽然《霍小玉传》的写成在《莺莺传》之后，但这种思想意识应是跟着“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这一类事实的发生而早就存在的。正是由于这种社会舆论的谴责，使这位和白居易、李绅等同时出现于当时诗坛的元微之，在他替自己的罪恶行为答辩时，露出了自己的尾巴。

唐代传奇小说盛于贞元、元和之世，和当时的古文运动一时并兴。当时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往往也是写小说的能手^[14]。他们的作品在宋元以后文学史上的影响很大，而《莺莺传》的影响尤为突出。这除了它比较真实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残酷，引起人们对莺莺的深切同情外；它在写作上的委婉、曲折，曲尽人情物态，也是一个原因。元微之《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两句，句下自注说：“乐天每与予游，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15]一枝花即是唐代传说中的名妓李亚仙^[16]。元微之和白居易听说一枝花，自寅至巳，这一方面说明元、白这两位诗人对“说话”这种技艺的爱好，一方面说明“说话”这种技艺在唐代贞元、元和之间已经相当发达，因此说一个故事可以花上三四个时辰，而听的人仍不会厌倦。这种“说话”，我们根据敦煌发现的唐代各种变文、俗讲来看，更可以推定它是有说有唱，同时有音乐伴奏的。唐代贞元、元和之间的小说，大都前面是一篇叙事的散文，后面是一首七言的歌咏，这和当时变文、俗讲的体裁有些相似；而叙事

的委婉曲折，描摹人情物态，生动周详，又正是一般通俗说唱家的长技。《莺莺传》及其他优秀的唐代传奇在写作上所以比较成功，正是当时文人接受了这种通俗说唱文学影响的结果。

由于《莺莺传》里主要部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在写作上又吸收了当时通俗说唱文学的长处，因此它在经过了若干年代之后，能够重新通过勾栏瓦肆艺人的说唱，回到广大人民中间去。但同时也由于它拖着一条引人厌恶的尾巴，当它流传到民间之后，终于改变了它的结局，使莺莺与张生以团圆终场。

二 从赵令畤到董解元

元微之的《莺莺传》经过唐末五代的兵乱，到宋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被收到当时官修的《太平广记》里。大约最初只是极少数的馆阁文人如晏殊（公元991—1055年）、苏轼（公元1036—1101年）等看到^[17]，而苏轼对《莺莺传》的传播关系更大。因为当时利用《莺莺传》的题材写作歌词或整套鼓子词的，都是他的门下士或和他关系极密的文人。这些文人以苏轼为首，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平时又多风流倜傥，喜欢和娼妓来往唱和，这就很自然地通过他们的传播，使这故事在勾栏瓦肆里流传开来。

苏轼门下的文人以《莺莺传》为题材写成的歌曲，有秦观（公元1049—1101年）、毛滂（约在公元1055—1120年）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畤的《蝶恋花鼓子词》。《调笑转踏》是一种歌舞曲，它是以八句七言的引诗和一首《调笑令》来歌咏古代一个美人的故事的。联合这样八个故事成为一套。秦观咏莺莺的《调笑

令》结句：“红娘深夜行云送，困殢钗横娇凤。”只写到她的月下私期为止；毛滂咏莺莺的《调笑令》结句：“薄情年少如飞絮，梦逐玉环飞去。”只写到她的答书寄环为止；内容都没有超越《莺莺传》的范围。这可能是由于体裁上的限制，因为凭借一首短诗、一首小令无法把故事的本末曲曲传出，给人一个完整的印象。赵令时的《蝶恋花鼓子词》，似乎正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而写成的。

《蝶恋花鼓子词》是由12首《商调蝶恋花词》和插在各首词前后的散文道白组织而成的。它除了在内容上、形式上都比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充实了、扩大了之外，还在结语里否定了元微之传末自以为“善补过”的一段话，而认为这样的结局是一种永远的缺憾。后来在说唱诸宫调和戏剧里，崔、张以团圆终场，可以说是这种看法的进一步发展。

赵令时在《蝶恋花鼓子词》的开端，说当时倡优女子对张生、莺莺的故事都能“调说大略”。可见这故事最初是作为说话人的题材在勾栏瓦肆里传播的。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说话人的传奇小说，首列《莺莺传》，它是和《卓文君》、《李亚仙》、《崔护觅水》、《王魁负心》等属于同一类型的儿女风情故事。说话人的听众主要是当时都市里的商人、手工业工人以及一部分的小吏、士兵，他们的爱好自然跟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不同。这样，《莺莺传》的结局便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文君驾车、相如题柱”的团圆结局，一种是“王魁负心、桂英报冤”的悲惨结果。然而儿女团圆的结局比之冤魂出现的场面是更为广大市民阶层所欢迎的，因此这个故事后来就演变为以第一种结局终场。

罗烨《醉翁谈录》所记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虽然是在南宋流行的，但在赵令时写《蝶恋花鼓子词》时，既然已有许多倡优女子能够“调说大略”，这话本应该是从北宋末期一路演变下来的。

现传《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里《张协状元》一种，从他开场时介绍的“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及“九山书会，近日翻腾，别是风味”等句子看，应是南宋中叶以后在浙江温州流行的戏文^[18]。这戏文有“赛红娘”和“添字赛红娘”的曲牌，可以推想到张生、莺莺的故事在南宋时候还曾被编作歌曲说唱的。可惜这些话本、唱本现在都没有流传下来。

现传说唱西厢故事的作品，在赵令畤《蝶恋花鼓子词》以后，最早也最完整的是董解元的《西厢记弹词》。董解元据元末钟嗣成《录鬼簿》的记载是金章宗（公元1189—1208年）时候人。他是利用北宋末期，崇宁、大观（公元1102—1110年）以来在勾栏瓦肆里逐渐流行起来的说唱诸宫调的体裁来写西厢故事的^[19]。诸宫调的体裁，主要是在一段散文的讲说之后，接唱一套自成首尾的某一宫调的曲子。这样一段讲说接上一套或两套歌曲，所唱各套曲子，宫调时有变换，词牌先后不同，不像《调笑转踏》或《蝶恋花鼓子词》从头到尾唱的是同一宫调的同一词牌，比较单调。董解元的《西厢记弹词》就篇幅约略估计，比《蝶恋花鼓子词》要增加15倍以上。它除了张生、莺莺之外，添出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新人物，如法本、法聪、郑恒、孙飞虎等。一些原来在《莺莺传》里不很重要的人物，如崔夫人、红娘、杜确等也开始有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面目与个性。故事方面，除了增加一些热闹的场面如张生闹道场、孙飞虎兵围普救；一些补充的情节如张君瑞害相思、崔莺莺问病等外，更重要的是把传文里始乱终弃的结局改成了崔、张团圆。由于广大人民是决不同意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作法的，因此这个对于《莺莺传》带有根本性质的改变和张生这个用情专一的人物的创造，是赋予了崔、张故事以新的生命，使它具有了明显的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

因而更容易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而成为后来许多文艺作品的重要题材。至于元微之《莺莺传》的末了，说莺莺在嫁人之后，张生曾以外兄的身分求见，莺莺坚决拒绝了他。在董解元《西厢记弹词》里，这以外兄身分求见莺莺而终于遭了拒绝的张生，实际上是由另一个角色郑恒来代替了。

《西厢记弹词》对于《莺莺传》，除了结局改变之外，许多增加的情节主要还是根据传文推衍出来的。如白马将军解围一节是根据本传“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统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这一节演成的。张君瑞害相思一节是根据本传张生自说“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旦暮”一段话来的。张生以弹琴挑莺莺，是根据本传莺莺答张生信里“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二句演成的。崔夫人因红娘一段说词，把莺莺许配张生，是根据本传“生尝诘郑氏（即崔夫人）之情，则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这一段话推想出来的。这些情节的增补，使这一对青年男女恋爱故事的发展更其入情入理，使读者的心情一路跟着故事的发展，关心着他们的美满结合，而痛恨那些要多方夺取他们、破坏他们、阻挠他们的反面人物，如孙飞虎、崔夫人、郑恒等几个人。

由于《西厢记弹词》是说唱诸宫调的体裁，这种体裁由北宋崇宁、大观年间流传到金章宗时候，已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一般民间说唱家是善于提炼民间口语和一般诗文里还有生命的词句来叙述故事、描摹人物的，董解元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卓绝。他有时连用十几支曲子叙述张生、莺莺的心情，便好像这一对封建时代的善良男女站在我们面前哀诉一样。有时描摹人物，淋漓酣畅，使人应接不暇；有时当紧要关头，又故意盘马弯弓，迟回不发。这些虽都是民间说唱家的惯技，但董解元确是运用得更纯熟的。

董解元在《西厢记弹词》的末了说：“君瑞、莺莺美满团圆，还都上任；郑恒衙内自怀羞耻，投阶而死；方表才子施恩，足见佳人报德。怎见得有此事来？蓬莱刘汭题诗曰：‘蒲东佳遇古无多，镂板将令镜不磨；若使微之见新调，不教专美伯劳歌。’”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崔、张团圆，郑恒自杀”这一结局，董解元是有所本的，至少那刘汭题诗的刻本是如此。这刻本据刘汭诗意推测，^[20]应是把西厢故事分绘成许多幅图画，附题些诗句在上面，或是一面图，一面诗，像后来有些戏曲小说的刻本一样。董解元《西厢记弹词》说白部分引了许多题咏西厢的现成句子，可能就是这些刻本里的诗句。再从董解元《西厢记弹词》说白里那些张生、莺莺唱和赠答的诗词看，除了录自《莺莺传》的以外，其他各章就体格意境看，显然不是同一个人的手笔。这些地方我们可以了解到董解元的《西厢记弹词》，实际上是从北宋以来各种有关张生莺莺故事的通俗文学、特别是说唱文学方面一种总结性的作品。

三 《西厢记杂剧》和它的作者

董解元《西厢记弹词》就许多以张生莺莺故事为题材的说唱文学看，确是达到了顶峰；然而它在全部故事发展和人物处理上是不免有些缺陷的。如孙飞虎兵围普救，直到白马将军出兵解围一节，将近全部说唱六分之一的篇幅，使读者的大段时间停留在刀来棒去的砍杀之中，这显然是没有使整个故事更紧密地环绕着张生与莺莺的婚姻问题发展。又如有些地方为了迎合部分小市民的口味，不免“浓盐赤酱”^[21]，形容过甚。有些地方为了“卖关子”、

耸动听众，使人物的个性不能恰合身分。如莺莺第一次见了简帖发怒，竟至拿镜台掷红娘；又如老夫人听了郑恒的话要悔亲时，莺莺竟私到法聪房里找张生，和张生在法聪面前要双双上吊，这是十分不合一个相国小姐的身分的。张生这个人物虽然初步塑造了个胚模，但显然还有不少地方没有经过细心的琢磨。如兵围普救时张生自说有灭贼之策，却一再留难，必等老夫人亲自相求，才肯出计，近于临危要挟。又如张生跳墙赴约，被莺莺拒绝时，他竟要和红娘“权做妻夫”，近于无理取闹。更其不合理的是当老夫人二次拒婚时，张生竟说：“郑公贤相也，稍蒙见知；我与其子争一妇人，似涉非礼。”这又把他写得太容易妥协了^[22]。《西厢记杂剧》里这些地方，都只是到了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才得到更合理的处理，使张生莺莺的故事成为当时以及后来封建社会里许多青年男女衡量人物的“春秋”^[23]。

王实甫《西厢记杂剧》，在当时所以会被人们看成像“春秋”一样的经典著作，首先是由于它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表示不满，正面地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全部《西厢记杂剧》主要是环绕着这个主题发展的。剧中人物凡是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忘餐废寝、坚定不移的，如张生、如莺莺，都给我们一个十分生动可爱的印象。他写张生、莺莺的月下私期，是那么的美满欢畅、有情有义；写他们的长亭分手，是那么的缠绵宛转、难解难分；使古今无数青年读者，为他们这种美满的恋爱生活所感动、所陶醉，这就很自然地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起了反抗的作用。

红娘这个人物的塑造，在王实甫《西厢记杂剧》里是特别成功的。她在反抗封建婚姻制度上是冲锋陷阵的猛将，使《拷红》一出至今还成为舞台上经常演出的好戏。她在帮助张生、莺莺时又

处处表现了她的热情和机智。她在莺莺焚香拜月时首先揭开了这位在封建家庭里长大的小姐的内心秘密；在莺莺看见了张生的简帖撒娇撒赖时，又替她撕下了这从封建家庭里带来的假惺惺面具；最后在莺莺月下赴期时，她更再三催促，鼓舞了她挣脱封建枷锁的勇气，毅然去与她自己的情人私会。这是很现实的，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如果没有第三者的有力帮衬，青年男女要想实现自由结合的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作者正是凭借红娘这个典型人物，给当时封建社会里无数青年男女指出了一条通向“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幸福道路的。

老夫人，作为维护封建婚姻制度的代表人物看，在《西厢记弹词》里，她的性格还是不够鲜明的，这主要表现在她对张生的态度还是有好感的。到了王实甫《西厢记杂剧》，张生在这位相国夫人眼里，才只是一个没出息的穷小子，可以随便给他一些钱打发他走的。到后来发现了张生、莺莺之间的关系，她为怕辱没相国家谱，勉强承认他们的既成事实；但同时便冷酷无情地逼张生离开了她们。由于她对这位穷书生攀上的这门亲始终不甘心，后来她听了郑恒几句挑拨的话便又翻悔了。当时人们所以拿《西厢记》当作经典看，正因为它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意见：一面提出了一对有情有义、全始全终的夫妇和一些为着实现这种理想婚姻而不惜自我牺牲的侠义人物，作为人们的典范；一面指出了那为着维护门户尊严不顾青年人幸福的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作为人们的鉴戒。明白了这一点，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必然要在郑恒触树、崔张团圆、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时终场，而不能中止于《长亭送别》或《草桥惊梦》，是不需要引许多考证资料来说明的^[24]。

在说白与曲文方面，王实甫是更能切合各人的声口，曲曲传

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感情的。我们从惠明送信时唱的《正宫端正好》这一套曲子看，王实甫对于那以爽朗泼辣见长的北曲并不是不擅长，可是当写到莺莺在长亭送别时，作者运用了同宫调的一套曲子，成功地表现了她的缠绵悱恻的情绪。此外如张生的热情而乐观，红娘的豪爽与机智，也都在他们的说白与曲文的情调里充分表现出来。为着更切合这一对在封建时代有相当文学修养的青年男女的身分，王实甫在张生和莺莺唱的曲文里熟练地运用古典文学里许多为人传诵的诗句和词汇，来传达他们一种深沉的心情和优雅的风格。这便是“小子多愁多病身，怎当你倾国倾城貌”、“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这些句子所以特别为古今许多青年人所爱好的原因。此外王实甫在描摹环境、酝酿气氛方面，更其是元人杂剧中的圣手，像“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等曲子，往往在剧情一开展的时候，就把读者的心情带到了一种具体环境里，与剧中人分享那一份月色与花香、风声与鸟语。这是我们在另外有些初期元剧作家的杂剧里比较难于遇到的。

关于《西厢记杂剧》的作者，有人以为是关汉卿^[25]，有人以为是王实甫^[26]，有人以为是王实甫写了前四本，第五本是关汉卿续作的^[27]，也有人反过来说，以为关汉卿先写而王实甫续作的^[28]。自从金圣叹的批本盛行以后，王作关续一说几乎成了定论。他主要的理由是第五本的曲文宾白没有像前四本那样的紧凑、典雅。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各种矛盾是不可能得到圆满解决的。杂剧的作者为了表达人民的愿望，虽然把一个悲剧的结局改成团圆，然而这是缺少现实的根据的，因此在表现上